

9月22日,依旧俗,杨振宁先生喜迎百岁生日。商务印书馆出版《晨曦集》(增订版),作为生日贺礼。翁帆女士为这一版《晨曦集》写了后记,本报获得授权内地独家刊发,并摘选杨先生世交挚友熊秉明先生所写《杨振宁和他的母亲》,以饯读者。

与杨振宁先生一起走过的日子

——《晨曦集》增订版后记

■翁帆

《晨曦集》于2018年出版,至今已三年。今年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李昕先生与我们商量出版《晨曦集》新版。之前,李先生在三联书店任总编辑时,和我们合作出版了《曙光集》。这次,我们决定增加《晨曦集》的内容,祝贺杨先生百岁生日。

新版《晨曦集》增加了不少内容,其中有两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一是杨先生1971年访问新中国后回到美国的演讲。杨先生是首位自美国访问新中国的华人科学家,他讲述了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眼里是新中国的各种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二是1971年邓稼先先生给杨先生的一封信,信中邓先生告诉杨先生,中国原子弹除了开始时有苏联专家的一点帮助外,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功的。杨先生见信一时难掩心中激动之情。

新版《晨曦集》中另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都是从几幅旧照片谈起。一篇是杨先生的发小与挚友熊秉明先生撰写的《杨振宁和他的母亲》。我记得初次阅读时,对熊先生的佩服之心油然而生。读者可以从熊先生对几幅照片的描述中,看到熊先生作为艺术家与哲学家细腻而敏锐的洞察力。另一篇是李昕先生的《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讲述杨先生的家国情怀。李先生的分析客观而中肯,足见其作为一名资深文化人与出版人的修养。

写此回忆时,正值七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上百周年庆典节目中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风景,让杨先生和我想起过去十多年在香港的日子。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是2019年2月。杨先生现在身体还好,只是不宜再长途旅行,这对先生来说是件憾事。对先生来说,开车四处“探索”是闲暇时的一大乐趣。我们最快乐的回忆之一就是自己开车穿梭于香港的青山绿水之间。香港



2010年杨振宁先生在太浩湖畔

给人的印象通常是高楼林立,其实香港的绿化率很高,达到70%以上。

杨先生喜欢开车,在85岁时才把开车的任务移交于我,在此之前,是他负责开车。那时亲戚朋友常劝他不要开车,可他自己乐在其中。他在香港开车的确有危险。香港车辆是靠左行驶,曾经两次他在左转弯时把车开到错误的一边,迎面而来的大巴司机急得指着我们大骂。幸好那时大巴那边是红灯,所有的车辆停止不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我们开着一辆十多年的老车。杨先生第一次带我翻越山林到沙头角时,上山走了一段路后汽车的空调便失灵了。香港的夏天非常闷热,开着车窗还是很难受,但是后来每每回想起来却觉得十分有趣。杨先生的秘书跟我们提过好几次:“换一辆吧。香港已经没有人开这么旧的车了!”后来,我们确实换了一辆新车,在前一辆车第十七个年头时。

杨先生没有因为自己不开车了而停下步伐。我则拿到驾照执照,杨先生就要我开车“上山下乡”。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拿驾照没有多久

就开车上了太平山顶。通常汽车开到山顶广场就会停下来,那次杨先生建议开到山顶。继续往上走,路只有一个车道那么宽,路的一边是没有遮挡的陡峭山坡。遇到下山的车时,只能其中一方退到稍微宽敞的地方让行。这段路程对新手来说会感觉如履薄冰,可是已经走到一半,无法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往上走。后来我问杨先生当时担不担心,他说一点都不担心。

又有一次,我们开车上大帽山。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海拔900多米。开车上大帽山并不困难,只是当我把车停到山上停车的位置时,我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汽车突然向前加速。车位前面两三米就是悬崖,附近站着的人人都惊叫起来。幸好我反应快,立即换踩刹车,逃过一场灾难。只是过后每每想起都心有余悸。杨先生却不当一回事,过一段时间他又提议上大帽山,被我坚定地拒绝了。杨先生笑话我道:“当初你和同学到内蒙古大森林背包徒步,我还以为你很有冒险精神,没想到你原来胆小如鼠!”不管他怎么软硬兼施,我

再也没有上大帽山。

相比之下,开车下乡的记忆轻松明快很多。杨先生第一次请我吃饭是在西贡郊区海湾上的一个港式餐厅。餐厅有一排圆桌沿着沙滩一字排开,沙滩窄而绵长,人与海是如此地近,可以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海湾里常有人练习风帆,再远一些有白色的游艇点点,再远一些有大大小小的岛屿。后来,这里成为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十多年来,我们一有空便到这里,面朝大海,看尽了这个海湾的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

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是划橡皮艇。我喜欢在这个海湾里划着橡皮艇到远处的小岛,沿途看险峻的水母,听深深的海水撞击岩石发出的深沉的咚咚之声,犹如钟鸣,让人紧张而兴奋。小岛上没有人烟,唯有白色的贝壳铺满地面。

杨先生只到过最近的一个小岛,去远处的小岛则不敢带他同行。那边的海水不如海湾里那般平静,手机也没有信号。有一次,我在岸上喝着茶看报,我出海很久没有返回,手机又联系不上,急得我差点报警。

西贡海湾在香港新界的东部。我们也喜欢开车一直南下,到香港岛南面的石澳村看海。石澳的海边有座小山,上山沿途可见巨大的岩石,海面广袤无边,景致相当壮阔。回程我们通常会经过赤柱和浅水湾。有时在赤柱的大排档喝一杯冷饮,有时在浅水湾大酒店喝个英式下午茶。

另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新界北边的鹿颈路。鹿颈路隔着海湾与深圳盐田区相望。鹿颈路沿岸有红树林,海湾的小岛上有成群的白鹳。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白鹳翩翩飞舞。看完白鹳,我们在村里的大排档吃走地鸡饭,老板总会拿出自己收藏的好茶请我们品尝。

杨先生总说,在香港不开车的话会错过太多的美好。的确,香港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就连沿途的自然风

光也百看不厌。郊外的路径和设施通常非常便利,又丝毫没有破坏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干预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一路走来,总觉得十分舒畅。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现在,茶余饭后谈起那些时光,我们还总体会到走在香港乡村路上的明朗与舒畅。事实上,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曾开车走过。我们曾在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和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开车走了四天,那时还是杨先生开车,我拿着一份地图当导航。我们合作完美,四天下来把两大公园走了个遍,一路顺畅。我们也试过自伯克利(Berkeley)开六个小时的车到太浩湖(Lake Tahoe),那一次经历也是非常难忘。

那时太浩湖区已经连续下了一周的大雪,我说去太浩湖太危险了,可杨先生坚持要去。那天,杨先生开完已是下午4点,我们租了一辆车,从伯克利出发前往太浩湖。一两个小时,我们开始进入山区,雪又下了起来,越下越大。天也开始黑了,山里的路已经积了一周的厚厚的冰雪,而我,从没在大雪中开过车!杨先生提醒我:“不要急转弯,不要紧刹车。我谨记这两点,在大雪中匀速前进,紧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握出汗来。更要命的是,我们租的车不是四轮驱动,而是一辆最普通的小型轿车。我们怕湖区可能因下雪封路,就打开收音机收听路况,可是汽车无线电功能太差,或者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声音极不清晰,只断断续续听到重复着的“Highway xxx...dangerous”(xxx公路……危险)。

直到路经特拉基小镇(Truckee),我们在快餐店问了一对从相反方向过来的夫妇,才知道前方的路没有封,可以继续前进。当我们抵达太浩湖边上的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

点钟。

第二天清晨,当我推开阳台的门窗,便知道太浩湖以她最美丽的姿态回报了我们的一路惊险。湖水蓝得发绿,雪厚地覆盖着屋顶,堆成柔和的曲线,长长的冰柱从屋檐垂挂下来。我们走在湖边的路上,一脚踩下去,雪快及膝盖。四处静无人,只有有时不时从松柏上掉下来的雪块发出啪啪的响声。

那些年,我们还试过在夜里开车到火山附近,看喷发出来的熔岩流入海里。那些时光,都是源于杨先生喜欢四处探索的冒险精神。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坚持,我大概会少了很多有意思的经历和体验。有些初次和我们见面的人问我是不是物理专业,是不是杨先生的学生,我有时这样回答:不是,他没有教我物理,他教我开车。

今年,杨先生99岁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开着车到处走。写这篇后记,既是记录新版《晨曦集》,也是记录我们一起去走过的一些日子。

2021年7月初于清华园



《晨曦集》(增订版),杨振宁、翁帆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6月,88.00元

杨振宁和他的母亲

■熊秉明

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伟大人物是在母亲哺育教育下成长的。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当然是三迁的孟母和在儿子脊梁上刺“精忠报国”的岳飞的母亲。在父亲缺席的时候,母亲就要代替父亲的角色,而比父亲更要苛求严厉,鸣机夜课,一心要把孩子塑造成她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完人。振宁的父亲离家五年,振宁的学语、学步、学识字、学背诵,都是母亲启蒙的。在父亲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懂事而神气十足的学童,识得三千字,能背《龙文鞭影》了。

回想振宁的父母,或者我自己的父母,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对婚姻问题大概有过相当大的困扰。可惜他们都去世多年,无法再问,关于这些事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他们生在辛亥革命之前,幼小时便由父母订下婚约,到了结婚的年纪,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一代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对旧式婚姻制度不免产生怀疑,或甚至产生强烈的反感。接受父母之命的婚姻呢,还是创造从个人的感情、思想、意志出发的家庭生活呢?前一种态度是否一定保守?后一种态度是否一定进步?前者是否一定导致不幸?后者是否一定获得幸福?恐怕很难给出简单肯定的回答。振宁的父亲,我的父亲,都采取了前一种选择。原因可能很多,大概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父母的决定是好的,并没有非反对不可的理由。其次,他们都在出国前结婚了孩子,若是留学回来提出离婚,对女方会造成很大的悲剧,在道义上不容许。再者,也许他们都是科学家,对“自由恋爱”的理想虽然也会有一种向往,但是他们更需要一个平静稳定的家庭生活,使他们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工作、子女教育,并对国家有所贡献。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家庭生活是成功的。我并不因此拥护“旧式婚姻”,但在过去,中国有“门当户对”的话,两家联姻必求文化背景、经济情况相仿,待人处世、子女教育的方式大致相同,两家又往往是世交,在这样的前提下,两人建立家

庭,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有良好的基础,在同甘共苦的历程中可以产生互相敬重、关切、体贴的爱情。细心的父母当然也会考虑到两人的年龄、性情、品貌之类。这样的婚姻要比浪漫结合的爱情稳固持久。当然有了这些前提还是不够的,如果不相信他们的结合有美好的未来,那么任何小的分歧都可能成为争吵的题目,甚至分手的借口。振宁的父亲曾经说:“夫妻应始终如一,胡适之从来嫌弃他的小脚夫人,我很赞成他。”(见《杨振宁家世述略》)

回顾过去,他们的婚姻是成功的。作为子女,我们感觉到在和谐温暖的家庭生活中成长起来。

1937年抗战的烽火把我们逐出了童年的乐园,两家都到了昆明,我们又成同学,同读西南联大,不过他念物理系,我念哲学系,见面的机会并不多。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教授夫人的生活和在北方的时候大不一样了。振宁后来写道:“我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克勤克俭的妇女,为了一家七口人的温饱,她年复一年地从早到晚辛苦操劳。她的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抗战时期。”

振宁1945年赴美,我1947年到法。50年代振宁获诺贝尔奖之后,我们在巴黎和日内瓦又相见几次。振宁的父母常居上海,我的父母常居北京,生前常有往还。我们则各在美国、法国生活到现在,已50年。

1973年,杨武之先生逝世于上海。后来振宁因常去香港,在中文大学长期有一办公室,便把母亲接去香港,直到她1987年病逝于港。《读书教学四十年》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振宁和他母亲的合影,摄于1983年。在这时,在这里,母亲的身材比他小许多。振宁低着头,弓着腰,小心翼翼地用手搀扶母亲走下中文大学宿舍前的四级石阶。勤劳的母亲还走在生命的最后一程,1987年患多发性骨髓瘤逝世,享年91岁(1896—1987)。

振宁的思想、心灵、人格的形成和他的家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

以在1993年10月发表的《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最后一节,他谈到未来,指出中国社会的特征对下一个世纪科技的发展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有一条是:“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伦理关系,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尤其是当代美国文化,不幸太不看重纪律,影响了青年教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他在儒家思想中看到非常积极的东西。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振宁的为学为人,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儒医”“儒将”,这里的用法,“儒”的意义是很积极的、宽广的,是中国文化所酝酿出来的而有普遍价值的“人文主义”。

他所标明的“儒家文化”,绝不是一些陈旧的教条所能代表的。他的领会要深刻得多,植根于集体潜意识的基层和个人的经验记忆,而弥漫到生活的各方面。他和他的父亲的关系没有所谓“反叛”或者“代沟”。他的父亲是数学家,他自己是物理学家、数学家。他沿着父亲的道路走去,走得更远些。两代人的关系是接棒的长途跑。他和母亲则有一种生命的默契。他说:“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单纯的,没有复杂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她是怎么想法的,她也知道我是怎么想法的。”

1972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过上海,振宁也恰好在那里。振宁的父亲患严重糖尿病,住在华东医院。我到病床边,他拉着我的手,长久地说了许多话,当然是动情的话,说得很恳切,但是我当时觉得,太属理智的劝导。后来我在杨家吃饭,振宁的母亲也和我说了不少话,是一些生活的点滴,不时插入一句:“不能说,不能说。”(“说”读如“所”)带有浓重的合肥口音。他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母亲浸在现实生活之中,或者说生存在寒暖饥饱的

层面上,她说的话是另一种论述,给我另一种触动。我于是想振宁的父亲所关心的和母亲所关心的很不同,我更关心他母亲所关心的。他做了一次访问中说他的母亲“不但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也没有受过很多旧式的教育”,那天的谈话使我觉得她自有明确的见解和判断。

那大概是60年之间我和伯母唯一的一次真正的谈话,童年在清华园的时候,我到杨家去,她也许问过我一些话,但我都不记得了。我见到她,是以孩子的眼光看一个玩伴的妈妈,我远远地看她,只觉得,作为振宁的母亲,她的存在是必然的,和我的母亲的存在一样。她们存在了,我们的存在也就真实而牢固,温暖而快活,健康而活泼。我们于是长大。

1982年振宁60岁,准备把过去重要的论文合成一集出版,约我以多主题封面书名。书出版后寄了两册送给我。论文是高深尖端的物理学,我当然不懂,但每页都附有“后记”(commentary)。用洗练活泼的英文记述论文产生时的背景,当时的生活片段,以及种种感受和思想,记下那个科学家在工作中的洞察、预测、怀疑和喜悦。我感到很有兴味。后记使那些充满艰深公式的论文有了生活的气息。论文和后记并非截然两回事。振宁常在访问和文章中提到科学研究中个人风格的问题,也就是说生活气息还会渗透到公式和表述里去。他又常说科学研究中的“美”,好的公式是真的,也是美的。我羡慕能读他的论文的人,他们在读论文的时候能呼吸到“先生之风”,他们读他写出的公式如读美妙的诗。

《杨振宁论文集》是一本600页的大书,扉页上他亲笔提了四个汉字:献给母亲。雪白的版面只印着这几个黑字,很令人注目。我看完后,觉得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献给父亲,而献给母亲呢?似乎把论文集献给父亲更为自然,因为在他学习物理的过程中,作为数学教师的杨武之先生曾对他有过很重要而且关键的影响。虽然书出版的时

候,父亲已经去世九年,但是仍然不妨碍献给父亲吧。我想这个问题不过是我一个人会有。但我不曾直接问过他,我想也不必去问。他做了这一安排,是从心里自然涌出的设计,这是属于生命的事,不待分析的。这一本科学成果和生活经历组合起来的自传,是智慧的结晶,沾附着生活的痕迹。这全息性的记录献给母亲应该是最好的礼物,这礼物代表这样一句话:“妈妈,这就是你的儿子。”

母亲是不可能去读的,因为那里面讲的是她陌生的高深学问,并且是用她所陌生的外国语言写出来的。然而有卷头的那四个字,便足够了,她可以有满足欣慰的微笑。

在《宁拙毋巧——与杨振宁教授一席谈》的访问里,振宁描写过他的母亲。他说:“我觉得她与许许多多旧式的妇女一样,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我很受启发。我想,她们的做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她们的做人态度不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来出发的,而这个观念是绝对的……我想,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件事变得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一种力量。从我母亲身上,我看出了几种礼教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一件复杂的事,用在一个家庭或一个人身上是好的,但是,用在整个社会上就不一定是好的。不过,它是有力量的,它有优点就是因为它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它有个信念。这个信念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说这是愚忠,我想也不是错误的。”最后,他对访问者说:“所以,你问我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就是这个。”

我认为孩子所认识的母亲是真实的母亲,本然的母亲,可以说是原始的母性。以自己的血孕育九个月,用自己的乳汁哺育怀中的婴孩,并提升礼教教会的。从本能的母爱提升到自意识的母爱,盼望他成长、茁壮,教他说话、走路,也是自发的。振宁所说的“礼教的优点”,其

实是母亲的优点。礼教所拟设的理想,还要靠活着的个体去实现。没有这样的母亲,礼教也就落空,成为虚伪的教条,甚至“吃人”的制度。赞美礼教的优点,其实是赞美母亲的优点。母亲的力量来自她自己对生命的信念。她的爱在另外一个生命中得到证实和报偿。

把存在的坚定信念和生命的猛壮活力传给孩子,使他在60年后捧出一本大书,虔诚而激动地在卷首题上“献给母亲”。母亲懂不懂不重要,因为她对相信这是一本好书,用大智慧和不息的勤劳写出来的书,有益于人类的书。她的爱得到收获。

198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三个月。伯母住在校内宿舍,已抱病卧床。我看振宁在榻边侍奉饮食,令我吃惊。他细心周到,很有耐性,绝不像一个有繁重工作、负有重大责任的忙碌的人。不久,伯母病笃去世。我到灵堂致哀。他特地引我到帷帐后瞻仰仪容。老人安详而平静,好像卸下了沉重的人生的担子,忘却了漫长的一生的劳苦和颠沛。我即刻想起自己的母亲。那时她还健在,住在昆明,已九十四。60年前在清华园的西院,两位老人时常往还。那几年大概是她们生活最平静最愉快的岁月。那也是她们最幸福的童年。告别遗体之后,振宁说老人家遗物中有一样东西要还给我。拿出来,原来是一串念珠。1985年我游南京栖霞山,在佛事里买的。因为我的母亲念佛,当时看到售卖部的念珠很精致净雅,买了两串,在上海时送伯母一串。但她不信佛。我说:“这是栖霞山买的念珠,预备带一串到昆明给我的母亲,这一串送给伯母,作为纪念的吉物,也代表我的心意。”她微笑着收下了。没有想到她从上海迁居到香港,一直带在身边。这时振宁拿出来,我觉得他想得真周到。我看看那一窝乌光闪烁的珠子,好像凝聚活泼的生命,浓厚幽秘的意义。我说:“由你留着做纪念吧,我母亲那里也有同样的一串。”